

中国梦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其实现离不开社会基层的配合与积极参与，离不开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离不开坚定有效的国家治理。脱离这三者，中国梦就难以体现于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非常容易变成舆论上漂浮的理念。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谈，是出于自己的焦虑，也是出于自己的希望——希望我们的文学界以中国梦为纲，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深深植入“共同体”的意识。

110年前，梁启超撰文《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谈国家治理之难。他写道：“中国人缺乏自治之力，事事待治于人。治之者而善也，则大纲初举，终不能百废俱兴也。治之者而不善，则任其弛堕毁灭，束手而无可如何。然中国治人者能力之程度，去待治者不能以寸也，故一群之内，错乱而绝无规则，凡桥梁河道墟市道路以至一切群内之事，皆极其纷杂芜乱，如散沙，如乱丝，如失律败军，如泥中斗兽，从无一奋起而整理之，一府如是，一县如是，一乡一族亦罔不如是。”按照他的分析，晚清社会之所以“混乱无法”，国民之所以“放荡无纪”，不外四个原因：爱国心薄弱，独立性脆弱，公共心缺乏，自治力欠缺。梁启超发问：四万万有高尚道德，联合起来形成国家的完备品格，“群治”何难之有？

梁启超也曾写小说、翻译小说，也曾进民初政界，企图像王安石那样移风俗、立法度。他的个人能力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无法施展，于是他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完全失望，转而投入他认为更适合于他的教育和学术。

伟大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令梁启超痛心的举国失治的景象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以为梁启超的“新民”观和上面那段引文还是有其警示意义的。当今，由于社会基层缺少共同体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责任感和服从规则的习惯，为私利不择手

段，国家治理的方面面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比如，运载水果的卡车在公路上倾覆，路边居民一哄而上，不是伸出援助之手，而是“不捡白不捡”；村民免费使用地下水，任意浪费，一旦收费，就水龙头滴水，恨不得水表不走；农贸市场（即“墟市”）的商贩为了货物的“品相”，屡屡使用违禁化学品。这样的事例不涉及命案，算不上极端，然而其性质同样是非常令人不安的：陌生人的利益与我无关；“社会”看不见，摸不着，为什么要我来负责？与这些现象相联系的是主城区之外的“凌乱无法”。走出北京的四五环，“纷杂芜乱”几乎触目皆是，生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的百姓依然“事事待治于人”！我们看不见乡、区、市政府的治理之手，只感受

在古代，中国人的社会意识是发育不全的。“社”是指土神，“社会”则是指春秋两季的社日祭祀土神的赛会。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释义“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很新的观念，一直到晚清才开始使用。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基层，“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意识却有点淡薄，这不能不说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近年媒体宣传的洪战辉等模范人物的事迹，都是以个人独自承担照顾家中的老弱病残成员为特点。这些模范人物面对的困难几乎难以置信，他们孤零零地应对，可见社会组织和国家不能为这些困难家庭提供帮助或福利保障。我国自古以来以孝治

## 基层·共同体·国家治理

□陆建德

到基层的麻木，那是组织机构的麻木和普通人心灵的麻木。清明前后，我在住处周围看到很多灰灰堆，十字路口较集中，有的还是在绿化带旁，像草坪上的一个个疥疮。我相信，那些灰灰燃烧之前是“天地银行”发行的“路路通”冥钱，数额都是以亿计的。在这些由玉皇大帝和阎罗共同签字盖章的纸币上，寄托了基层民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祭奠者不会想到收拾纸灰（比如说装到塑料袋子里，再扔入垃圾箱），他们走了，正如年三十在公共空间燃放鞭炮的人往往留下一地狼藉，回家看春晚，脏乱差的局部小环境是对中国梦的恶意嘲弄，即使不多，我们看在眼中，也应痛在心上。

天下，过分强化家庭的作用，强大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反而无由产生。其实，没有社会共同体的大家，小家也无法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

如果作家热衷于书写丑恶（包括官场腐败），书写一己的小算盘、小聪明，使得读者也潜移默化，视之为生存之道（“鸟为食亡，人为财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容易沦落为一个大批互不关属的、游离的个体的集合体，那些单子上有着坚硬的我，互相碰撞、倾轧，无法协调合作，形成“群力”，100多年前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就是这种可悲状况的体现。以占便宜还是吃亏来看待生活，就容易对社会、对周围的人，产生戒备和敌意，而这敌意对共同体来说



大白话

□陈世旭

## 尊卑

尊卑一般和贵贱连着用，尊即贵，卑即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指地位的高低；“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礼记·乐记》）指长辈和晚辈；“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信陵君窃符救赵》）车座分左中右，以左为尊；进了房子，座次、座向也有严格规定，坐北朝南为尊位。

古人把尊卑次序看得很重：“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隋书·音乐志上》）我国是个重传统的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尊卑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自然延续下来。因为毕竟是现代社会，自然也有不满。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就抱怨过：“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尊卑来。”

我因为对传统无知，又不谙世故，更是常常为此困惑。有一年，陪一班作家到地市采风，因为人多，用餐分了两桌：一桌坐的是接待方和作家中有一定职务的，一桌坐的是接待方的普通工作人员和作家中在其原单位没有任何职务的。我急了，作家来自全国各地，皆是我们的贵宾，凭什么按职务分高低呢？结果是为了尊重接待方的安排，我只好自己端了饭碗去到“没有职务”的那一桌，说这一桌由我负责陪吃陪喝，打个哈哈混过去。还有一回，坐单位的公车出差，有顿饭是当地一家企业老总请客。吃饭时桌上拢共才三四个人，却不见我们单位的司机。一问，老总说：我们另有安排，司机怎么能坐这儿？那不没规矩了！我是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规矩，说：他是我哥们儿。老总说：那也不行。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起身谢宴。

可叹的是，随着岁月的老去，阅历的增多，我终于明白等级观念已然深入社会骨髓，任何个人只能老老实实服从，恪守贵贱有序、尊卑有位中自己的本分，否则就会被看作非我族类，更有甚者会被鲁迅《狂人日记》提醒过的那桌宴席吃掉。但又于心不甘，总想论个生死。

“尊卑有序”的明确倡导者是我国历来奉行的儒家，认为国家社会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权力和义务，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和行为规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初衷是对道德的追求，尊卑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有德者方可居高位。但在2000多年的君主制度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尊卑有序的形式化和极端的虚伪性，君王的私欲，使圣明成了一句空话，随机性的所谓清明政治，压根儿就没有任何保障。而且，认定君、父、夫必然比臣、子、妻道德高尚，更是绝顶的荒唐。

人人平等是现代文明的基础，法律赋予人人平等的权利。当然，有一点必须特别指出，在疯狂逐利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见到的许多高高在上的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往往是得志小人。因而，“平等”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上。一旦人们追求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平等，社会和人类的厄运就不是多么遥远的事了。

显然，人人向往的平等，应该回归到精神追求的层面，即便继承和奉行“尊卑有序”，也应是品行高尚者与品行低劣者的尊卑有序，高尚者为尊，低劣者为卑。尊卑有序应该是指不同的人位于不同地位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应做出的适当行为，而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权力财富地位的高低所应遵循的繁文缛节。

窃以为，这才是尊卑有序该有的意义。

## 观影记

读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路易斯·贾内梯的《认识电影》，无比喜欢。“认识电影”的同时想起从前看过的许多部电影，而其中的专业术语丝毫令人发懵。合上末页，啧啧于如此出挑的译笔，400来页的大部头没一句不顺畅，堪称信达雅的典范。回到扉页，才发现译者赫然“焦雄屏”。

台湾电影教师、学者、剧作家、影评家、监制……百度里的这一大堆名头，又激发我进一步走近她的念头。追赏她的专栏随笔《焦雄屏的电影世界》，听她说起杨德昌的生前点滴，看她提携华语世界里的新晋艺人，都是后来的事。

第一次将畅达的译笔对应上屏幕里太过丰腴的她时，真有点不能接受。然而，跟现实世界里的际遇不同，我们认识名人学者的路径往往始于文字和内心。这种逆向的选择，注定内心的羡慕还得依附精神气质上的吸引。应该说，焦雄屏以丰厚的学养、温暖而有灵魂的文字和一种真正的人文胸怀，彻底俘获了我。再看她不分粉黛地对着镜头，像邻家妇人般哀戚地叙及杨德昌病榻上坚持作画时，早已喜欢上眼前的“真的焦雄屏”。

同为女子，焦雄屏让我笃信文化的修和内心的淬炼才是惟一的修颜妙方。《焦雄屏的电影天地》中数百篇的随笔，以纵横的笔法和摇曳的文姿，传达自家深厚的电影眼光并与读者分享了人生里的百般况味。与崔卫平以政治历史的视角挖掘电影之“背后”不同，她更多着意于文化上的隔阂、移植与碰撞。有人评价她的文字朴实、温暖和有灵魂，私以为，她予我最大的感佩在毕生的“爱国心”，始终襟抱大华语电影，引着一个优秀的电影新人攀上国际影坛的最高领奖台。

一次对话节目中，性情激越的陈丹青坦言偏嗜大陆三四十年的老电影，对其他时代的电影人口出微词，她笑着蹙眉问：“您是不是对第五代导演过于严苛了……”无论是对话前辈吴天明还是新人章子怡和徐峥，她从未有过一次强势的表达。这展现出焦雄屏的另一个身份：合格的采访者。她从低位处之，善于聆听，长于提问，将更

## 斯人焦雄屏

□吴萍

多的自由给予对话者，让对方拥有最大的话语权，让观众分享到艺人背后真实的心路历程。此时的她，渗出历经岁月后优雅的清贵气。

读了她的随笔自述，方知她曾是蔡明亮的老师，是《十七岁的单车》的监制，是朱家天文天姐妹的老友，也是吴念真的合作伙伴……当年带着蔡明亮去戛纳，正是她的主力和坚持，才让《爱情万岁》保留末尾长达7分钟的哭泣镜头。也还是她，初见还是小姑娘的章子怡，就偷偷塞了“好好学英文”的忠告给她。2002年的《蓝色大门》，倘若不是她，很难想象后来的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展示和500万元新台币的票房。

焦雄屏早年与大陆电影颇有隔阂，直至后来在日本的一次集中观影才让她大开眼界。她又说，一直很拒绝看早年的大陆电影，因为父母。她的父母从不跟她谈及大陆的陈年往事，那些黑白的影像里埋藏着父母的乡愁。这样的乡愁是随血缘和基因的，所以她说第一次看《我这一辈子》时哭得稀里哗啦。焦雄屏内心的“乡愁”也是一腔爱国情，只不过她将此融入电影叙述中表达了。这虽说是个体的，却是切肤的，也必然是含泪深情的。

工作身份的缘故，焦雄屏是很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常客，看过来自各个国家风格迥异的艺术电影，也看过太多导演的喜极而泣。可是，她并不人云亦云，总是审慎独立地去辨别一部影片的良莠。她的影边杂谈中写到，电影节上许多铤羽而归的电影，都被她视作珍宝。她期许更多普通的观者看到好电影，而不是“金鹰奖电影”。比如她所说的芬兰怪才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我曾无数次将这个导演的《薄暮之光》和《火柴厂女工》推介给朋友们。

斯人焦雄屏，让人喜欢不独是其广邃的视野和丰沛的学养，最深处当是温暖悲悯的人文情怀，这也是物欲时代中太多学者所缺的。她透过电影艺术这扇窗，洞察娱乐大国的浑噩，直贬媒体价值取向的差池，深醒文化隔阂的后遗症，呼唤更多的电影人从现实中提炼出人性之美、人性之光。



夏云(油画) 萧浦苍作



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不久全国人大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日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与民族命运的战斗，这场战斗既给中华民族投下了空前的灾难，也凝聚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精神。今天它所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依然是那么强烈而震撼。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当那些曾经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们逐渐离我们而去，在和平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将会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这场战争，又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来保留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记忆？当然，对抗战我们会拥有历史的、政治的、军事的等等研究来进一步推进那些理论上的认识，但那些有关这场战争的鲜活的感性内容，那些具体的细微的战争生活的细节，那些涉及了无数人命运的真实的故事，还能否被我们继续感受和讲述下去？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将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基于这一想法，我放下了自己30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的笔，拿起了文学创作的笔，写了一部《长河谣》。在这部小说中，我想写出的历史真实首先是山东德州这个局部区域曾经发生过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故事。

对于广袤的中国土地上的抗日战争而言，德州无疑只是一个局部的微小的点。但就是在这个微小的点上，我通过史料了解到，它所发生的有关抗日的故事，就是巨大的文学资源库。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德州抗战的史实很少有人发掘，德州人民浴血抗战的故事很少有人讲述。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抗战初期的德州保卫战，曾是山东抗战打响的第一枪，也是一场极为惨烈悲壮可以载入史册的战斗，但是却鲜为人知。不仅有关抗战史的研究很少有人关注，就连文学史上也没有过描写。据少量历史文献记载和一些当事人回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逐渐离德州大举南下，一路连克天津、沧州等城市，9月底兵临德州城下。当时攻打德州的是日军有名的礮谷师团，是一个日军的甲种师团（在整个侵华日军中，只有6个甲种师团）。守卫德州的中国军队是原西北军编入国军系列的孙桐萱将军率领的第八十二师，孙桐萱率二十师、独立旅及军部布防在德州以南的平原、禹城一带，作为德州保卫战的后续。第十二军乃西北军的老班底，一直隶属当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及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节制。战斗的具体过程

我在这里就不再叙述，仅从史料记载日军攻陷德州的时间来看，就可想而知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10月1日日军在有飞机助阵的情况下向德州城发起进攻，3日攻陷德州。一个甲种师团攻陷一个德州小城竟用了3天时间。据孙桐萱将军生前回忆，日军因攻陷德州不利，当时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香月清司曾受到日本军部申饬。

再一个例子就是冀鲁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冀鲁边区是中国北方人民抗战的一个重要区域，在这里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如1939年3月的大宗家战斗，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一部与驻德州日军一个联队交

争。写到民间抗日的主体力量，往往都是由共产党组织起来的贫苦农民，而大多数乡绅阶层不是自愿或不自愿地充当汉奸角色，就是胆小怕事只顾保住自家利益的庸人。这种写法近些年虽多有改变，但还没能形成根本性的突破。其实，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一下抗战史实就会知道，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乡绅阶层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以农耕生活方式和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而乡绅阶层正是这一基础的代表，它在传统农村社会起着重要的维系、协调、平衡、凝聚作用，无论是中国历代的统治者，还是国民政府乃至抗战时期的共产党，都离不开这一阶层的利用和来自这一

## 关于民间抗战的文学书写

□季桂起

阶层的的支持。同时，乡绅阶层出于保家卫乡的动机，在面临侵略者威胁时，也会自发地利用自身在传统农村社会的号召力，组织不同形式的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从发生到今天已过去了几乎四分之三个世纪，表现抗战历史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其中却鲜有能够与国际上表现二战题材的作品相媲美的经典性作品，原因当然有很多，不过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我们过多沉浸在对战争苦难的品味和对战争胜利的狂欢上，而缺乏对战争与人的命运之间关系的反思与表现。不错，战争以其巨大的破坏性给遭受战争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种灾难所造成的痛苦是一般性的破坏无与伦比的，所以它往往在战争的伤害一方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虽然能够强化人们对战争的记忆，但也往往阻碍人们对战争作更深刻的人性反思。我们之所以需要抗战文学，是因为我们需要文学来书写和延续我们对战争的记忆，然而“铭记历史”并不意味着强化仇恨，而是更深刻地理解战争珍惜和平。那些仅仅从品味苦难、强化仇恨和欢呼胜利出发的文学书写，无疑是偏狭的，它放弃了对人性和人的命运的深刻反思，放弃了化解民族仇恨与抚平战争创伤的努力，也就无法真正承担“铭记历史”的使命。

在抗战文学中，写民间抗战题材的小说，大多形成了一个固定叙事模式，那就是把阶级斗争的意识强加给了民族斗

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中国人民坚持了长达8年的艰苦抗战，一定是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整个民族，支撑着他们面对侵略者的屠刀和野蛮而坚守自己的节操，守护着一个不堕的信念。那么这种精神到底是什么？在小说中，我把这种精神的内核主要归结为儒家文化。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有它消极的东西，但在国家、民族真正遇到危难的时刻，它的积极的内容确实发挥了其他思想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从孟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东林党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一代代儒家人积极入世、敢于担当、秉持气节的精神。事实上，儒家文化的这种精神在中国的民间确实起到了号召与凝聚人心的作用。

对于儒家文化在抗战中的精神作用，很多作品把民间的抗战或者解释为有组织的政治动员，或者解释为原始的生命力的迸发，或者解释为个体的复仇之举，没有深入认识到儒家文化在抗战中凝聚民心、汇集民力的积极作用，这是抗战文学的遗憾。当然，我这部作品对此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也没有做得很好。

最后用小说中一个人物张弘范的话来结束本文。他在日本投降时帮助了落魄的日本人藤田一家，受到了侄子的质疑，他对侄子说：“孔圣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都有落难的时候，将心比心，他们的国家惹了大乱子，今儿败了，可老百姓也没什么大罪过，咱打老祖宗时候起，就讲究个‘和为贵’。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还有甯管德国人也好，活在这个世上都不容易。别都再打打杀杀的了。这要是冤冤相报，那啥时候是个头啊！咱今儿帮了他一把，兴许就会改一改他们日本人的心性。这要是日本人的心性改了，别再干那些畜生不如的事儿，咱咱中国人说不定也算是件好事儿。唉，就是不知道这日本人的心性能不能真改得了。”弘范的这番话可以说代表了中国人对待民族之间关系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儒家精神留在中国这个民族血液中的永恒抹不去的传统。

当前，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以严肃历史态度而创作的作品当然很多，但也有些作品尤其是影视剧作品采取了凭空虚构历史的写法，甚至有些荒唐到违背了正常的历史知识、生活知识。这些作品给人们们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一种把残酷的战争娱乐化、商业化、庸俗化，以狂欢式的态度过度消费战争资源的现象。